

政治人类学评论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view

2016 · 2

政策人类学： 新政治人类学与公共服务

Anthropolog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on Policy-making (APAP):

第 4 辑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 and Public Service

陶庆 ·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公共治理本身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
首先田野调查对公共治理的研究会有作
如果不接地气，不来自于基层，
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很可能是一个「柏拉图」
「希望在田野」，
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与人类学的结合，
一方面是做人类学的「田野」，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做一个有收获的「田野」。
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如果真的能够跟
人类学有很好的结合，
必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 4 辑

政·治·人·类·学·评·论 (2016·2)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view

政策人类学： 新政治人类学与公共服务

Anthropolog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on Policy-making (APAP):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 and Public Service

陶 庆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策人类学：新政治人类学与公共服务/陶庆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政治人类学评论；第4辑)
ISBN 978-7-5520-1612-3

I. ①政… II. ①陶… III. ①政策科学—文集 ②社会
人类学—文集 IV. ①D0-53 ②C9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7716 号

政策人类学：新政治人类学与公共服务

主 编：陶 庆

责任编辑：路征远

封面设计：黄婧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20.25

插 页：2

字 数：266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612-3/D·409

定价：7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 办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政治人类学研究所（筹）

主 编

陶 庆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骏 王浦劬 朱光磊 刘建军 阮云星 李俊清 和少英 何国强
范 可 周 平 周大鸣 罗红光 林尚立 金太军 赵旭东 竺乾威
郭苏建 徐 勇 徐杰舜 钱 杭 高丙中 商红日 常保国 董建辉
纳日碧力戈 蔡 骥 Chuan-Kang Shih

编委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

徐 勇 高丙中

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振兴计划“学术刊物”类建设项目

“《政治人类学评论》（培育）”

资助成果（A-0233-16-005017）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重大项目

“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资助成果（11JJD810018）

迈向公共治理的政策人类学(代序)

周大鸣

为什么需要迈向公共治理的政策人类学? 因为要推动学科的发展,就不能拘泥于自己研究的一小块阵地,别人做的方面也要去推动。在应用方面,在工商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策人类学等方面我都会推动。因为人类学很多时候像在“象牙塔”里的一种学术,没有走出来。我们希

望人类学能够走出“象牙塔”,能够迈向公众,让大家知道人类学。

一、人类学、政策人类学与公共管理学

人类学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人类学是一个研究人的学科,大家可

作者简介:

周大鸣(1958—),男,湖南湘潭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该文系周大鸣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专题讲座录音整理稿。

讲座主持人:陶庆,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研究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

讲座录音整理:陈津京、耿浩雪、徐如飞等三人,均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

能讲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都是研究人的学科，这没有什么特色，用一句话概括人类学的研究特色：人类学是在研究差异，关注差异。这个和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恰好是相反的，公共管理学关注的是人的共性，因为只有找到了共性才能够制定公共政策，但是人类学是找差异；其实这不矛盾，个性和共性是对立统一的，能够找到个性自然也能够找到共性。人类学相对其他学科而言更喜欢寻找差异，常常要做一点和其他学科认为是普世性的观点相反的案例出来，这个是人类学喜欢做的事情。比如马格瑞德·米德(Margaret Mead)，他反对美国当时最流行的法学界的观点，认为青少年越轨行为更多是因为青春期所造成的。米德去一个比较原始的部落作调查，他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经过青春期，并不是所有的人经过青春期之后都会有一个比较骚乱的时期；他认为人的性格不是生物性的，主要是由后天的文化所决定的，这是一个例外。又如北大的蔡华教授专门研究一个亲属制度，列维施特劳斯说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元素是父亲、母亲，而蔡华教授所研究的纳

人，这个民族里边没有父亲，所以他写的那本书的名字叫《无父无夫的社会》，这就是找一个例外告诉列维施特劳斯，你讲的普世性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人类学就是研究这种差异。大家觉得这种差异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是告诉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把这件事说得太绝对，不要认为这是普遍真理，人类社会千差万别，各种各样你想不到的东西其实都普遍存在。比如默多克(G. P. Murdock)写的《社会结构》中人类家庭的类型、婚姻的类型。经过一个跨文化的比较之后发现其实在整个世界的不同文化中，一夫一妻制在整个人类社会里边所占的比重极少。人类学研究差异，解释这种差异的来源是什么，不同差异的人群他们怎样相处，这是人类学最终想关心的。这种关心和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所关心的是一致的，人类学所关心的是人群能够协调，就是现在所谓的和谐社会建设，就是让大家和睦相处，文化差异极大的个体怎么能够在一起相处相融。另外，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人类学中讲文化，概念很多。比如阿尔弗

雷德·克洛依伯(Alfred Kroeber)和克 莱 德 · 克 拉 克 洪(Clyde Kluckhohn)所写的书中有 168 个关于文化的概念与定义,人类学中所讲的文化概念的结构主要是从 3 个层次来讲: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比如物质文化相关的技术系统,制度文化相关的社会系统,心理文化相关的观念系统。从文化使用的角度来看,技术系统可以看作一种文化使用的结果,社会系统可以看作一种文化使用的机制,观念系统是文化使用的策略。技术系统是工具,有调节温度、供应食物、交通、通信,这些都是工具,随着科学文化的不断进步这种工具发展得越来越复杂;另外我们运用能量的技术、医疗的技术、制作各种器皿的技术。制度很重要的一点是千差万别的人群为什么能在一起生活,就是靠这一套制度。人类最早是亲属、性别、年龄、职业这么一些类别,还有居住的群体、社会组织,但是人类学研究的这一套社会制度是最基本的。人类学研究婚姻制度、家庭制度、亲属制度,首先研究最基本的点是乱伦禁忌,一个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制度,允许一部分人或

者是禁止一部分人和另外一部分人发生性关系,每一个社会都有这样的制度,人类学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套制度产生,这套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后果是什么?人类社会很多基本的东西是从这里出发的,我们现在的组织体系、各种规范制度很复杂,但是我们人类划分群体、类别的基点就在这里,而且每一种文化中对这种限制、禁忌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讲变与不变,中国文化也是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三套制度:血缘、亲缘、地缘,以血缘为主的宗族制度,以亲缘为基础的亲属制度,以地缘为基础的民间信仰制度,在中国文化中这些东西是很少变的。而且中国文化中把这三套制度发展到极点,全世界没有一个文化有中国亲属制度这么复杂,全世界没有一种宗教有民间信仰这么复杂。对宗族制度有一个评价:明朝 GDP 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第一?因为宗族组织的规章制度、组织方式已经具备了现代的资本主义组成公司法人的所有元素。血缘是所有东西的一个组织原则,宗族组织已经跨越了血缘、地缘,它只是利用这样一个原则来组织一个公司。当然

现代社会用各种缘分组织起来的组织越来越多,比如以学缘组织起来的学生会。另外,信仰系统会分为宇宙观、权威观、财产观,还有价值系统、宗教系统,这是人类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人类自身有一个精神的世界,而且这种个体的差异很大,这一块就更复杂,每一种文化中的价值观、审美观、文化精神、宗教系统都是极为复杂的。人类和动物的区分就是因为有了宗教,如何克服自身文化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去作研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主观的观念,当你去研究一个他者文化的时候怎样克服这样一种主观意识的支配去看别人,这个在人类学中讨论得很多。

公共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社会经济和管理危机后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这样一种新型的行政概念应运而生,即要抛弃传统的公共管理强制性和垄断性,强调政府和企业、团体、个人的共同作用。强调作评估的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如政府、企业团体和服务的对象等各方,如何把各自的需求、各自的意见协调起来。公共治理不再是一

种强制性的,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自上而下的,这个类似人类学部门,人类学很反对自上而下的而强调自下而上的,我就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去看需求者他们需要什么,而不是说我们管理者最想要什么。这也是公共治理这个概念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这就刚好跟人类学的基本理念不谋而合。

另外,我也看了一下关于公共治理研究中一个热门的研究,在这个研究里面,我在百度学术里面搜索了一下,关于政治学的,超过1万篇;社会学,4900多篇。可以看到学科之间的差异,从研究论文的基本概念,可以看到一些学科的差异。政治学关注的比较宏观、概念性的,例如,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方法、公共治理主体、公共治理在中国、网络化治理、教育公共治理、公共转型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重复研究极多,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主体、公共治理在中国这一类的东西,竟然有1万多篇文章都在讨论。从这一点分析,我就特别支持陶庆教授主编《政治人类学评论》中的主要观点,即作政治学研究,一定要“接地气”,否则就会不断地炒人

家的冷饭。中国社会千差万别只有经过扎实的研究,才能提出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相对来说,社会学有4 000多篇文章,基本上研究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网络治理、弱势群体等,相对来说研究的对象比较具体,这个是从文章来看两个学科的特点。从这一点分析也可以看到,政治学学者与公共管理学学者如果能够更多地进入田野调查的层面的话,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可能会有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以上是我这个外行来看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态度与结论。政策人类学大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产生,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估来服务。政策人类学的产生跟人类学的产生有关系,人类学一开始产生就被深深地打上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烙印,因为它一开始是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服务的,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批判资本主义学科的时候被扣上了这样的一项“帽子”。当然,人类学家也做过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比如说像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他对印第安部

落文化的研究,经过把印第安文化分区,然后每一个分区作很多调查,把这些东西用于政府制定政策。所以美国政府在处理印第安人政策的时候比较成功。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政府建国以后处理少数民族的政策。像英国帝国主义比较强势的时候,他占了大概比他多1万倍的面积的殖民地。当时人类学家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帮殖民地培训官员,为帝国统治殖民地服务。英国杰出人类学家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说,他曾花了10余年来做这样的课程,主要就是为了殖民地的政策服务。可以看出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殖民主义服务。在“二战”期间,人类学家特别活跃,像米德(Margaret Mead)专门研究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因为当时美国和盟国很多军人、家属在一起生活,所以研究怎么处理这种关系。所以长期以来美国的人类学家为战争服务,战争人类学的讨论非常热烈,有的说学者不应该干预战争,而很多人类学家说通过我的研究提出的政策至少会减少战争所产生的屠杀。美国在打伊拉克之前、在打利

比亚之前，他们都有很长的研究：他们应该怎么样跟当地居民相处？他们当地人的文化习俗是什么样的？这都是专门有人给上课的，因为他对假想的敌对国很早就开始了解，但反过来我们会对他了解吗？比如说我们现在搞“一带一路”，我们对历史还比较了解，但对于现状还不太熟悉。现在我们去非洲是被人家讨厌的，因为不了解当地人的文化，不知道怎么跟当地人相处，尤其是不懂得怎么样跟当地政府打交道，这就使有些投资结果变得很糟糕。人类学觉得这种研究很重要，你要了解当地人，否则比如我们帮非洲人修铁路修公路反而费力不讨好。比如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写的《菊与刀》，是为美国占领日本后如何进行管理提供一个依据，告诉你日本的民族性是什么样子，日本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你怎么样去跟他打交道，所以最终美国治理日本就很成功。当然“二战”后，人类学发展到一个顶峰，很多人类学家开始检讨，人类学作应用性的研究太多，所以开始转入所谓纯学术的研究，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出现很多人类学的学者甚至大师。但是不幸

的是，这个学科又回到“象牙塔”，这个学科越做越小。“二战”后，基本上在美国每一个大学，都会有人类学系或者人类学研究所等机构，参与美国各种各样的咨询公司非常多，现在关于反思人类学、阐释人类学、象征人类学、结构人类学这些都是“二战”后出来的。

但是相对来说应用人类学方面就比较薄弱，所以大概人类学在经历了20年(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纯学术研究人类学再一次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献计献策。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人类学家要重新给自己定位，这一段时间，海外殖民地已经没有了，一种利用强权背景来作研究的环境已经没有了，所以要改变策略。同时，国家自身所处环境的问题越来越多，人类学开始为政策制定评估服务。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学开始更积极地参与政府、NGO组织、跨国企业等等方面的合作，导致了各分支学科为社会服务的风潮广泛兴起。

应用人类学中有几个分支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是医学，现在医学

人类学做得极为成功。长期以来,医学本来是直接面对人的一个学科,但是他们把它看成一个纯自然科学,不与人文社会科学打交道。但是,例如艾滋病这一类的病都是跟人类的行为直接相关的,如果医学不跟人文社会科学结合,你的研究是没用的。西医太科学化了,不同文化的人很难去接受它。中国医疗体系里面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就是西医和我们的中国文化差异很大。所以通过一个调研来对医患关系进行改善,就觉得会有很大的作用。所以现代医学人类学在医患关系、传染病这方面的防治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

另外,就是经济人类学,主要是为国际跨国企业服务的。比如NIKE专门有跨文化办公室,请一些人类学家来为他们服务,因为这些跨国企业工厂就在不同的国家,要管理不同国家的工人,这是一个大学问。另外,商品要销售到不同的文化群体里面去,要不同文化里的人能够接受,所以在大型跨国公司的决策方面,都需要请人类学家去做顾问。在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作投资项目的评估,以前在

投资项目的评估里面没有社会评估这一部分的,以前有财务评估、经济评估、环境评估,但是后来发现不作社会评估不行。2012年,国家发改委专门正式发了一个文件,现在我们国内重大项目凡是跟民生方面关系比较大的项目,都要作社会评估。作社会风险评估,我是把它用一种文化变迁的理论来解释的。假定每一项投资成为一种文化变迁的动力,那么这种动力所导致的变迁有哪些方面?我们作文化变迁研究,我们知道要去考察哪些基本的要素。一种是直接的影响,一个是间接的影响。这里只是一个基本的政策评估,一个政策落实首先分析利益相关者,每一个利益相关者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投资项目也一样,它的利益相关者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直接影响是什么、间接影响是什么、不同的人群怎么样来看待你这个项目?这是前期评估,项目过程里面的监督评估,项目完成以后,有项目完成以后效益评估。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阶段,你是可以作不同的研究的。在项目完成以后去作效益评估,如果是你仅仅看人家报上来的数字那是不行的,要用

人类学的方法来参与到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去。我的一个朋友参与美国市中心的改造，因为美国的这个城市中心基本上成了一个少数族裔居住的地方，所以城市中心地带变成了一个很麻烦的地方，特别是华人区。他们有一个计划，要改造城市中心。城市中心有很多房子没有人居住，所以在这个城市中心办一所华盛顿大学的分校，10年以后好很多了。这是人类学家参与城市改造的一个案例，在美国这一类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城市要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会邀请很多不同学科特别是人类学专业的人来参与。

二、中国的应用人类学实践

早期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很关注应用的价值，早期很多人关注边疆学，因为帝国主义列强进入中国以后他们作了很多这一类的研究。日本人以前作这个研究，想把蒙古人、新疆人、西藏大都从中国这个“大家庭”分裂出去。英国人在西藏作研究，他们花钱让西藏人去留学，来接受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喝甜茶的习惯，其实就是英国人留下来

的。但是从医学的角度研究，在高原喝甜茶对人的体质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国内有学者意识到这个重要性，我们也要研究边疆、治理边疆，这是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角度来谈的，所以作研究的时候，要去看背景。在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就有人提出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民族，那是因为在一个很特别的历史时期提出来的，像顾颉刚这一批历史学家，他难道不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有很多的来源吗？他当时就是为了要对付日本人，所以他强调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民族，强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这是一批学者在民族危机的时候提出来的。当时有很多的学者就直接去当县长，民国政府任命这批学者。另外，还有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其实不仅仅是现在的话题，现在我们美丽乡村建设，比如梁漱溟、晏阳初，从那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乡村的问题。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别的社会转型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在这个转型过程里面没成功，清朝的灭亡、士绅阶层失落，整个乡村变成无序。所以当时梁漱溟说乡土沉静，只不过对于怎么样去建设，他们提出的方案不一样。梁漱溟从儒家的角度，

晏阳初从乡村的现代教育的角度,他们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乡村建设。然后,吴文藻、费孝通很多人都提倡乡村建设。就是怎样认识乡村,怎样去解决乡村的问题。费孝通写的《乡土中国》是报刊上的一个连载,他用很通俗的语言来向大众介绍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什么样。要想去改造它、建设它,首先要认识它本来是个什么样子。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开始提倡并实施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强调在民族地区怎么样建立起自己的新型民主政权。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就是1947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我们党在延安时候作农村的基本调查、作少数民族的调查以及怎么样来准备在这些地方建立起新型民主政权,这一套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我们党在北方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甘肃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其实当时天祝成立藏族自治县的时候藏族人口还不到5%,现在大概占到30%左右,当时中央政府组织了很大规模的调查团来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个为后来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发挥了很大作

用。当时很多的学者,特别是人类学家广泛深入地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了,对这项工作很多人写过文章,但是我们还是要放回到原来背景上来分析。费孝通讲的基本点是对的,他就提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国家建立,怎样摸清家底,诸如我们这个家庭成员里面有哪些人等,这个必须搞清楚;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也要搞清楚。所以做这样一种民族识别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制定管理的政策法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与边区的发展,费孝通提出要有两“眼”,一个“眼”是远海的改革开放,另一个就是少数民族与边区发展。他的例子举得非常好,一盘围棋要有两个“眼”才能活,如果中国只有一个“眼”就无法活起来,所以要注重少数民族与边区发展。这是有眼光的、有前瞻性的一个观点,因为少数民族居住在中国的边疆,与很多国家相邻,如果不把边区发展起来,那怎么跟周边国家建立联系?更何况很多民族本身就是跨境的,过去很多民族不管国界,在两边都可以活动,所以这

种跨界的民族很多。还有扶贫减贫工作，我们做了很长时间这方面的工作，每一任领导都把扶贫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目标。但是大家就想不通的是，怎么越扶越贫？这就是我们的政策导向有问题，因为现在有的地方有的人不是以脱贫为荣，而是以脱贫为耻。我们曾经去过吉林的一个城市作调查，该市把脱贫的帽子取掉了，他们少了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少了很多财政支持，都保证不了公务员的工资发放了。因此，现在是谁能够争到贫困县谁就是英雄，所以贫困县越来越多。广东其实有不少贫困县，但是国家规定广东不能有贫困县。广州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地方，最富裕的地方可以跟最富有的国家地区相比，最穷的地方也可以跟非洲落后的地方相比，比如粤北、粤西的山区等。

所以怎么做扶贫减贫项目？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所谓“精准扶贫”就是要落实到每一户。人类学家参与较多的另一个研究是旅游开发，这个事情不知道是好是坏，但是对于扶贫减贫确实有益处，这也是当地政府当地人都愿意参与的事

情。现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得很快，几乎每一个省市都把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扶贫项目。当然这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如关于文化的保存和传承问题。我对黔东南的印象特别深刻——所有的村寨都统一化，去过一个就不用去第二个。为什么？因为这都是旅游规划的人设计出来的，他们穿同样的衣服、表演同样的曲目，并且拿着竹子做的同样的乐器，所以把文化多样性的东西变成文化单一性的东西。我有个学生专门研究如何把旅游跟人类学结合起来做旅游开发，在这种开发的过程里面确实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也不乏失败的例子，这取决于大家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旅游开发最重要就是把政府、公司和当地的村民多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处理好，如果处理不好，这个事情就做不好。比如广西龙脊的梯田属于桂林市，政府把经营权一次性卖给一家公司，那个公司什么也不干只设一个关卡收门票，当地村民得不到好处，便在旁边另开一扇门——那边收100元，村民就收60元；那边收60元，村民就收30元，这样就会闹出一些社会矛盾来，不利于社会稳定

与社会发展。

三、个人的一些研究体验

我想讲一些个人实践,我们也做了很多的项目,现在讨论很多的是干群关系紧张。政治学、社会学的很多人都去作过这个研究,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干群关系紧张的实质是什么?我自己作了这么多研究,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干部在代表国家做一些反文化的事情,反文化就会要遭到各种各样的抵抗。我讲这个事情不带有别的意思,有一些做法确实是在反文化,我们的生老病死等公共事务处理问题上都存在反文化的现象。比如计划生育,其实这件事情搞不好也会产生反文化的恶果,如,有的地方的乡镇干部号称这是天下第一大事,有的干部就像对付阶级敌人一样来对付这些怀孕的人,每一年专门都有计划生育突击月,把公安、医院的人集中到一起,专门去抓这些所谓违反计划生育的人,老百姓一直就反感这些东西。以前还有各种税费,现在农村的税费都取消了,所以这些都会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我认为

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做的这些都走到了反文化的境地,老百姓难以接受。而且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都“喜欢”做反文化的事情。还有类似的事情存在,如关于燃放鞭炮,春节的时候中国人喜欢燃放鞭炮,现在除了上海、广州、北京等几个大城市做到了禁止燃放鞭炮,其他城市都没有做到,因为没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维持这项法律的执行。也就是说,如果是反文化的事情,你就是制定了法律那也没有实际效果,如果你有太多反文化的法律规定的話,那最后会导致法律失去权威性,因为人们就不把法律当一回事了。所以我们做事情、制定公共政策,应尽量少做一些反文化的事情,要做一些能够顺应文化潮流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否则执行不了。

再举一个村民选举的例子,这也在政治学研究中比较多见的情况。我也看过很多村民选举,我觉得在中国有的村民选举,异化为家庭选举,这是我自己的结论。因为现在是投票制度,一个人可以投3票,一个人去投自己家庭的3张票,

他不可能投给不同的人。所以村民在哪里？实际上村民就在每一个家庭里，其实在农村里面，每一个选民各有自己选择权的可能性不大。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是在华南地区，即宗族的力量很强，如果你不投同一个宗族人的票，就要担负很大的风险。因为在华南这些地区，最重要的不在于选举本身，而是在于选举完了以后怎么样保护弱小群体，这是更重要的事情。一个村里基本上是单姓的家族比较多，其他杂姓的人很少。比如说我这个村里面可能都是姓周的，可能70%的人姓周，只有30%的人不姓周，要选村主任、选书记的时候一定是选姓周的，这个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你把姓周的选出来，怎么样保护那些不是姓周的人的命运更重要、小姓不受大姓的欺负更重要。珠三角过去没有那么多单姓村，之所以单姓村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很多小姓改姓依附于大姓，所以这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因此，如果村民选举不制定一个制度来保护小姓，保护弱小群体，这个问题肯定会越来越严重。从我去过的那些村落来看，村主任、书记基本又回到了大的宗族里，所

以大家再去研究村民选举的时候，可以去观察看看这不是一个家庭选举？还是不是所谓的村民选举？当然，在同一个大的家族里面不同的支系之间也会有竞争，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

再讲“新莞人”现象，因为“农民工”不好听，大家觉得“农民工”带有歧视，东莞是农民工最多的一个地方，大概本地户籍人口200万人，800万名农民工，加起来1000万人口。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新莞人管理局，我让几个研究生去作关于新莞人的调查，他们跑了好几个镇去问这里有没有新莞人，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新莞人是什么，说明这个新莞人还停留在政府的宣传层面，而且实际执行力很弱，因为关于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新莞人有很多的规定，就是实行所谓积分制。可能大量能够满足条件的人未必愿意成为新莞人，因为愿意成为新莞人的最重要原因是家里有孩子要上学；凡是家里孩子要上学的人，有本地的户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点，需求就不是很强烈，因此，尽管有很多人有足够的积分可以成为新莞人，他们也不在意这件事情。